

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孙中山在信中提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煌煌万言致书李鸿章的孙中山，当时并不像一个革命者，而似一位忠于朝廷，又希望国家富强的改良派。是什么让孙中山走上了革命道路？难道不是包括李鸿章在内，整个清廷漠视民声，无视民瘼吗？单从这个角度比较，李鸿章比俾斯麦差之远矣！俾斯麦任内，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在外交上，俾斯麦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又岂是李鸿章可比。

在戊戌变法之际，李鸿章被慈禧委派，与英国商量《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前往北京。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中主导日本战胜了大清，如今又成为大清皇帝的座上宾。维新派的本意是请伊藤博文来给光绪介绍经验的。哪知道伊藤博文到北京的时候，因慈禧的出手，戊戌变法已不可能成功。1898年9月20日，伊藤博文见到了光绪，此时的皇帝已经意兴阑珊。在伊藤博文离去后不满24小时，光绪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伊藤博文乃写下这么一段话：“今皇帝急于改革之处，万事学日本，衣服等亦改以西洋流……（又传变法派）企图排除皇太后……实难知晓中国之事。”

谁最知晓中国之事？似乎没有人比李鸿章更清楚明白！因甲午兵败，积蓄李鸿章多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几乎罄尽，外加慈禧怪罪下来，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而此时的清廷，看似吸取了甲午战前买洋军备买来一些无法发射的鱼雷等等坑人货的教训，换“以夷制夷”为“结强援”，拉拢沙俄等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李鸿章办妥此事后，参加于1896年春举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随之又考察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行程九万多公里。古稀之年，考察列强，李鸿章大开眼界，感慨良多。甚至得出欧美之“立国政教”的经验之谈：“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故而，在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李鸿章选择了参加“东南互保”，亦即在清廷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开战的时候，时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铁路大臣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于1900年6月达成清朝南方各省督与各国驻沪领事们的《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参加这一《约款》的还有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在北京城乱作一团的时候，

这些东南督抚联合表示，不知道太后老佛爷去哪儿了，皇室对11国宣战的诏令，是义和团胁迫下的“矫诏、乱命”，东南各省在不知诏书真伪的情况下，可以抗命不遵。

这种情况，令清廷在中华大地的权威性大幅度减损。甚至有人动议，索性让李鸿章称帝，中国可以进一步分裂。张之洞则称，作为备案——万一找不到慈禧和光绪的下落，李鸿章可以出任中国总统，主持大局。

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下，李鸿章接到了朝廷旨意，要他北上京城议和。可李鸿章并没有动身，直到1900年6月，在连续接到催促电报，并再次被授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李鸿章才缓缓从广东乘轮船到上海。毕竟已是77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说一句身体吃不消，当缓缓而行，也并非仅是推脱之言。当然，李鸿章在上海，亦是在观望时局，亦探听在沪各国公使的意向。而他的部下则在劝说——《马关条约》，不就是老佛爷让李中堂去签的吗？之后的替罪羊是谁？前车之鉴，别再北上了。

李鸿章接到慈禧“准予便宜行事”的电报，加之此时，各地封疆大吏看准风向，开始关注起李鸿章北上之事，他才开始动身进京。此时的国家，已经有着分裂的趋势，国人生活已不知有多惨淡。一年以后的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之前，曾作绝命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1900年的中国，其实早已是这样的景象。

巍巍华夏，何以新生

李鸿章知道自己去北京的使命。无非能让慈禧得以回銮。至于中国会怎样？这一点，是否在他的考虑之列呢？显然不是。

1900年8月，慈禧已经以光绪的名义发了一篇“罪己诏”——本质上说，慈禧把罪责也都推给了光绪。而比起此前向列强宣战所用“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翦彼凶焰，张我国威”云云来，这回西太后来了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句话说，即便在被欺负了一个甲子以后，在八国联军登陆之前，大清仍以天朝上国的气势在俯视列强在唬人，可在庚变挨揍之后，又以仰视甚至雌伏之态，希望朝廷能够苟延残喘。而李鸿章也明白，慈禧在派出和谈代表的时候，不仅派出了他这一位汉臣，更加派了一位“铁帽子王”奕劻。何所谓“便宜行事”？只不过是慈禧一时间乱了方寸后，不得已之言。